

马大正主编

中國古代邊疆政策研究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编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

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

主编 马大正
副主编 林荣贵
编辑 刘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范明礼
责任校对：李钊祥
封面设计：鹿耀世
封面题字：陈中扶
版式设计：赵梅阁

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

Zhongguo Gudai Bianjiang Zhengce Yanjiu

马大正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 经销

京安印刷厂 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7印张 2插页 434千字

1990年2月第1版 199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800册

ISBN7-5004-0503-0/K·60 定价(平)：7.05元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出版说明

研究中国边疆史地，首先应当弄清楚什么是“边疆”。关于“边疆”一词的含义，过去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我们认为，边疆是地理概念，它与国界线有密切的关系。简单地说，“边疆”就是靠近国界的地区。在中国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随着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国境范围时有变迁。因此，历史上中国的边疆不是固定不变的。

从古代起，中国边疆地区与中原地区就有密切的联系，但二者之间又存在不少差异。边疆地区在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明显地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些差异和特点，规定了中国边疆史地可以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周秦以来，记载疆域经略、边疆地势险夷、区划沿革、驻防兵制、政教措施、边民风情、民族政策、边臣疆吏的典籍，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这反映了先人对边疆问题的重视，也为后人进行边疆史地研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到了近代，中国的边疆与内地一起陷入危机，使几代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为警示世人，一些仁人志士、专家学者，或创辟榛莽，或继往开来，终于建立起中国边疆史地学这门独立的学科。不过，囿于时代、阶级和观念的局限，人们还未能科学地认识和说明边疆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虽有一些力作堪称珠桂，但其数寥寥，影响有限；疆域沿革与边界变迁问题又曾一度被视为研究禁区，致使这门学科长期停滞不前，与繁荣社会

主义科学文化的要求极不相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了科学的春天。为促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本着开拓、开放的精神，承担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的组织工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关怀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支持下，这套丛书终于得以陆续付梓。我们期望这套丛书能够引起学术界的兴趣和共鸣，有助于推动边疆史地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有助于促进人才培养和在全国形成一支比较稳定的、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队伍。

丛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严谨的科学态度，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以本学科独特的方式为巩固祖国的统一、加强民族团结、促进边疆的开发与建设做出贡献。

丛书选题广泛，包括中国边疆史地学科的许多重要方面，从各个角度探究边疆的各种问题。诸如边疆史地理论、中国历代疆域、边疆民族、治边政策、边疆开发、边疆文化、边疆外交、边疆政教、边疆海岛、边疆人物、边疆考古、边疆历史地理和近代边界变迁等最新研究成果，都将收入这套丛书之中。

中国的边疆，包括陆疆和海疆。以往人们多注重陆疆问题而疏于海疆的研究，这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我们提倡在研究中陆疆海疆并重，不可偏废。

中国边疆史地学的内涵是复杂的、多重的，对它的全面认识，不可能一次成功，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因此，呈现于读者眼前的这套丛书，一定有许多不足，甚至谬误。我们热诚地希望得到批评和指正。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1988年7月20日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序

丁伟志

吕一燃、马大正同志要我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的出版写几句话。本想敬谢不敏。冒充内行，乱写序言，是双重过错。可是又推辞不掉，因为出版这套丛书的主意最初是我提出的，这套丛书的出版我理所当然地该承担一份责任。

1985年夏，我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负责与边疆史地研究中心联系，当时曾和中心的负责人邓锐龄同志多次商量边疆史地中心的工作。为了改变边疆史地研究成果零星散落、发表困难、效益不著的状况，我向邓锐龄同志提出了编辑出版《边疆史地研究丛书》的建议，得到了他无保留的赞同。此议，又得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吴家珣同志、副总编辑余顺尧同志的全力支持。经过从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学者们三年来的埋头苦干，提供了第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加上编辑们的努力，现在丛书终于得以付梓。

说来有趣，我和历史地理研究凑巧还有点机缘。这是童年的事了。我的父亲是顾颉刚先生主持的“禹贡学会”的会员，他常常在家里做些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工作。童年时期，我还有幸在北京小红罗厂8号“禹贡学会”院内度过一段难忘的时光。当时懵懂无知，但是父辈们勤奋阅读浩繁的文献典籍、一丝不苟地绘制历史地图的情景，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我觉得那的确是一桩非常庄严的事业。实在惭愧，童稚时期的这段经历，并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但是这段经历却也使我对于历史

地理的研究始终抱有一种相当强烈的亲切感，并且也很容易接受阐明历史地理研究如何重要的道理。

说这番纯然是个人色彩的话，并不是想表白自己于边疆史地研究有什么特别的发言资格，也不是想证明自己对于边疆史地研究具有特别强烈的个人兴趣，而只是想表达一下一种心情，这就是自我感觉还比较容易领会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性，因而出自内心地愿意为这项事业稍尽绵薄，为它做些推荐和鼓吹之类的事。

边疆史地研究有什么重要意义，这在丛书的《出版说明》中已有充分阐述，我只想针对目前颇为流行的“历史无用论”一类的误解说点想法。现在确实有一种对历史学的误解，就是认为历史学，特别是古代史研究，对于现实的改革和建设没有什么用处；认为研究历史问题既不能解决现实国计民生的大问题，又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可见这必定是一种脱离实际的、无法应用的、学究式的活动，不值得提倡和重视。难道果真如此吗？我想颇为人们视为冷僻之道的边疆史地研究，就足以证实此种见解之大谬。边疆史地研究的现实价值，通常是到了边界纠纷时才会被突然想起，其实它的价值远不止体现在政治纠纷与军事冲突之际；在和平建设中，这种研究又何尝没有重大价值。为了实现现代化，在我国广阔的边疆地区规划经济文化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难道不需要边疆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帮助吗？在我们推行开放的方针、发展与周邻许多国家的经济关系和友好往来的过程中，难道不需要边疆历史地理研究成果的帮助吗？恐怕只能说，我们过去的眼光太短浅，看不到边疆史地研究这种“养兵千日”式日积月累的平凡工作所具有的长远的现实价值，看不到它所蕴蓄的重要社会效益（不只是政治的、军事的，而且包括经济的和文化的效益），因而对它的重视程度极为不足。现在是到了扭转那种把历史地理研究看作无益于现实的错误观念的时候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丛书》的出版，苟能有助于此，也是一大功德。

当然，对于边疆史地研究的效益，不能从狭隘短视的功利观

点上去衡量。边疆的历史地理，是历史形成的，它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相当复杂的演变过程，因之对于它的研究不可能不具有相当大的难度。文献和档案资料浩如烟海，搜求剔取、整理爬梳之难自不待言，边疆地区的实地考察无疑更是要备尝艰辛的事，何况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还需要多学科的综合知识为必备手段。这方面研究成果自需铢积寸累，不能一蹴而就，“前人栽树，后人得实”的事也是常见不鲜的，况且这种研究成果往往是要经过若干中间环节和多次转化才能实现，其现实的社会价值不能不切实际地要求关于边疆史地的一切研究都直接具有立杆见影的现实功能效用。因此，在充分估计边疆史地研究具有重要社会效用的同时，又要充分认识这种科学的研究的性质，尊重其学术事业的特性，切不可动辄以“脱离实际”“冷僻无用”罪之。

正因为是科学事业，边疆史地的研究过程中，出现匡正旧说、提出新见的事，论断分歧、发生争议的事，都是不可避免的、正常的，都是学术发展的契机。也正因为这样，边疆史地研究的成果，所表达的只能是学者们的学术见解，而不是代表任何社会集团的意愿，更不是代表政府在边疆问题上的政策和态度。切切不可把学者在边疆史地研究中发表的学术观点错当成某种政见而给以过分的责怪，或过度的重视。只有各界人士把学人之言作为学人之言宽厚待之，学者才能在边疆史地这个有时还颇带敏感性的研究领域中放开手脚做事，边疆史地研究这块科学园地才能真正得以垦拓，得以繁盛。

1988年8月1日于北京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本由多人参加撰写的专题论文集，收选了有关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的14篇文章，分为两组：一组以时代为序，对先秦至清代前期的历代边疆政策做了系统的论述；另一组按专题排列，探索了我国历代边疆政策中带有共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传统治边思想、边疆管理机构、和亲政策、土司制度等。从总体看，可以说是一部系统论述历代边疆政策的颇具匠心的专著；分开看，则各自独立成篇，对论述的问题做了深入的分析。

目 录

前言	马大正	(1)
夏商周的边疆问题与民族关系	段连勤	(5)
秦汉的边疆政策	王宗维	(49)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边疆形势与边疆政策	周伟洲	(84)
隋唐的边疆政策	林立平	(150)
辽朝的政区双轨制及其对北部边疆的管辖	林荣贵	(182)
宋朝的周边形势及治边政策	陈佳华	(215)
元朝的边疆政策	罗贤佑	(251)
明朝的边疆政策及其得失	杨绍猷	(279)
清朝前期的边疆政策	张羽新	(315)
我国古代传统治边思想初探	刘 迅	(354)
我国古代边疆管理机构概述	赵云田	(387)
和亲论	张正明	(424)
略论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李世渝	(465)
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综述	马大正	(495)

前　　言

马大正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世界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自秦始皇建立中央封建集权国家以来，悠悠二千载，出现过多次大的统一局面。秦汉时期开创了全国统一的先河。隋唐王朝疆域的开拓，扩大了中原传统政治、经济和文化与边疆地区的联系，实现了“华戎同轨”、“冠带百蛮，车书万里”^①。宋、辽、金之际，汉族与边疆各少数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意识，各族人民克服了战争造成的种种困难，内地和边疆的开发与交流进一步发展。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开创了我国少数民族一统全国的先例，中原和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族本身，发生了长达近百年的富有特色的大融合，改变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传统结构和狭隘观念。及至明、清，特别在清代前期，清政府在元、明两代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全国大一统，基本形成了现今的疆域范围。消除边疆地区的割据势力和抵御外侮，成为这一时期边政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有分裂，有战乱，但每次分裂和战乱，都为下一时期更大范围的统一和发展准备了条件。中国历史发展的这一特有规律，已日益为研究者所认识，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开展对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的研究，提供新的视点，开辟新的领域，将使这一研究进一步深化，达到更高的水平。

①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赞》。

无论哪一朝哪一代，都面临自身的边疆问题，统治者也都为巩固统治制定并实施相应的边疆政策。边疆政策的成败得失，不仅直接影响彼朝彼代的兴衰存亡，而且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形成、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中国封建社会的边疆政策，自秦汉时期初具规模后，经隋、唐、元、清诸强大统一王朝的充实、完善，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在世界各国历史中是颇具特色的。时至今日，古代边疆政策对于维护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也是一份有待认真总结、批判继承的重要历史遗产。

中国古代边疆政策内涵十分丰富，为人们的研究提供了广阔的领域，其重要方面至少有：

一、历代边疆政策的综合研究，包括各个历史时期中不同政权的边疆政策研究；

二、边疆政策中一些带有共性问题的专题研究，主要包括边疆行政建置、边疆经济开发、边疆民族的文化与宗教等；

三、边疆政策重要组成部分的历代民族政策和近现代边界政策研究；

四、边疆政策制定的重要前提之一的传统治边思想研究；

五、不同时期、不同类型、不同国别边疆政策的比较研究；

六、边疆政策所涉及的政治、军事、民族、经济、文化诸领域的研究；

七、与边疆政策有关的人、事、地、物的研究与考证。

对于这样一个在一定程度上牵动历史发展全局的大问题，进行历史的微观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历史的局部、细部考察得愈清晰、准确，对由局部、细部构成的历史大厦的整体认识才愈有可靠的根据。当然，历史的真实性，是史学研究的第一价值尺度，但是，我们不应满足于史学的微观考究，还必须对中国古代边疆政策进行宏观的历史研究。我们应从宏观上，亦即相对整体意义上考察历史过程的内在联系，以寻觅寓于历史事实之中、隐于历史现象背后的更深一层的历史本质。只有这样，才能揭示中国

古代边疆政策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在促进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中的历史作用。

对于中国古代边疆政策进行宏观研究，是本论集的主旨和选题的出发点。入选的14篇论文，依内容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以时代为序，对先秦至清代前期的边疆问题和边疆政策分题论述，以探讨各个时代边疆政策的特点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为重点，力求照顾全面，做到重要内容无遗漏；第二类则是选择历代边疆政策中一些贯通几代的带有共性的重大问题，诸如传统治边思想、土司制度、和亲政策、边疆管理制度等，寻求其发展、演变的轨迹。

还要着重说明，第一，本论集所论及的边疆是指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相连接的地区，并以此为基础上溯古代，参照历代王朝边疆的实际情况予以综合考察。边疆地区主要包括今天的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省区，至于沿海诸省，以及台湾、海南（包括南海诸岛）则无论古代还是当代都是边疆地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第二，本书研究的对象是中国古代各封建王朝治理上述边疆地区的政策，而不是近现代的边界政策。为突出重点，各篇论文以研究统一王朝的边疆政策为主，并着重从巩固、开发边疆的角度加以评述。

参加本论集撰写工作的有北京、西安、武汉等地的14位作者，包括学术上卓有建树的中年专家和有希望的青年史学工作者。他们在完成自己繁忙科研工作的同时，积极合作，辛勤笔耕，使本论集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完成了从选题到定稿的全过程。当此论集交付出版之际，回顾以往的愉快合作，令人欣慰；瞩望未来，切盼合作领域能日益扩大，能有更多的学者参加我们的工作。

“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成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①。无论是《中国古代边疆政策研究》，还是“中国

① 《老子》，六十四章。

边疆史地研究丛书”，都是一种尝试，一个起步，我们切望得到各界前辈和同仁的指点，使我们的工作少出差错。

1988年5月20日

夏商周的边疆问题与民族关系

段连勤

今天的中国是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的。早在夏商周时期，中国的版图就已经从黄河中、下游流域逐渐向四周扩大形成了被称为中原的中心地区，而边疆则是包拢着这一中心地区的外围地带，从而奠定了几千年相沿至今的基本版图。孔子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①，从政治上的联系性和继承性方面揭示了我国先秦历史的发展过程。同样，这个道理也适用于先秦至秦汉以后的历史发展。比如，历史上中原王朝对边疆民族推行的和亲、羁縻政策以及征服战争等等，早在夏商周时期就作为统治王朝处理其同境内外关系的政策措施而广泛地实行了。其中有些方面，如和亲政策，由于商品交换关系发展的落后性及血缘纽带残余的浓厚存在，还成为夏商周统治民族笼络外族、扩展势力、争夺和巩固政权的一种手段。因此，对先秦时期的民族关系和边疆问题，进行一些追溯和论证，不仅对阐明夏商周三代的历史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对理解和研究秦汉以后中原王朝推行的边疆民族政策，也是有裨益的。

一 夏朝的边疆问题与民族关系

大约公元前21世纪时，夏族（史称夏后氏）酋长大禹及子启

① 《论语·为政》。

建立夏朝。夏朝历17君，“用岁四百七十一年”^①，至桀而亡。

夏朝属传说时代，其境内的主要少数民族为南方的三苗族和东方的夷族；被后世称为西戎、北狄的西方民族和北方民族，当时尚未进入历史舞台。三苗被禹征服后即销声匿迹，传说资料也很少再提到它。而东夷同夏朝的关系，不仅贯彻夏朝始终，而且对夏朝的盛衰兴亡亦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夏朝同东夷的关系是本节讨论的重点。

夏朝是我国由原始公社制社会进入奴隶制社会的第一个朝代。禹、启为夏朝开国之君。启死后，太康“盘于游田，不恤民事”，人民痛恨夏朝的统治，东夷酋长后羿乘机夺取夏朝政权，史称“太康失国”。少康复国后，夏朝进入强盛时期，东夷诸部相继归附夏朝。从帝孔甲起，夏朝进入衰亡时期。帝桀时东夷“内侵”。商汤乘机联合夷人，灭亡夏朝。

（一）夏后氏的婚姻外交及夏朝的建立

夏后氏原居我国西部，大约是黄帝族向西发展的一支。至禹父鲧时，夏人在酋长鲧率领下东迁，并与东夷大姓有莘氏、涂山氏联姻。鲧娶有莘氏女曰女志，禹娶涂山氏女曰女娲（一曰女娇）。有莘氏姒姓，生禹。尧舜时男子有从母姓之习俗。如尧本姓祁（亦作祈），其母庆都姓伊，故尧“或从母姓伊祁”^②。禹以前，唯有莘氏为姒姓。至禹，夏后氏亦姓姒。秦嘉谟《世本辑补》云：“《史记·五帝本纪》曰‘禹为夏后，而别氏姓姒氏’，则姒姓从禹始耳”^③。帝舜赐姓之说不可信，夏后氏大约是因禹母族姓姒才为姒姓的。涂山氏，《潜夫论·志氏姓》载远古氏族“或氏于居”^④。涂山原应为山名，后演变为居其地的氏族名。

① 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② 徐宗元：《帝王世纪辑存》，34页，中华书局，1964年版。

③ 《世本八种》，260页，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④ 《潜夫论》，卷九，《志氏姓》，4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禹以前古东夷太昊族有女娲氏（亦称有娇氏），与西方之少典氏世为婚姻，族女任姒嫁少典生炎帝。春秋时今山东有任姓小国，太昊后。古任与仍通^①，故《路史·国名纪》载“太昊后任国，或曰仍也。”有夏一代，任姓（亦即有仍氏，亦称有缗氏^②）为启，相妻族，夏的灭亡，亦同此氏族的向背关系极大。《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载“桀克有缗以丧其国”，其情形颇类西周姬姜间的关系。因此，涂山氏可能为任姓。我疑夏时东夷任、姒姓，可能同太昊族的任姒有某种关系。鲧因治水失败被殛死后，夏后氏并未因此而一蹶不振，相反在有莘氏和涂山氏的有力支持下很快发展起来。夏朝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太昊后裔有莘氏和涂山氏大力支持的结果。《左传·哀公七年》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把盟会地选在涂山，大约就是为了就近获得涂山氏的支持。

传说太昊居陈，今河南淮阳县。其后裔59姓分布于今山东大部和河南东部及安徽北部。春秋时今山东济宁、费县、东平境内尚有任、颛臾、须句、宿四个小国，均太昊后。夏时有莘氏居“有莘之野”，相传即今山东曹县北之莘冢集。涂山氏居涂山，其地杜预《左传集解》谓“在寿春东北”，即今安徽怀远县之当涂山。有莘氏和涂山氏对夏朝的支持态度和亲密的婚媾关系，无疑将促使太昊后裔诸氏族部落归服于夏朝。

大禹生于我国原始公社瓦解时期，亦即所谓禅让制时代的末期。传说他本人曾在帝尧时成功地领导了规模宏大的治洪工程，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帝尧任命他为部落联盟议事会的成员，后又被确定为舜的继承人。这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原始公社制的进一步瓦解，部落联盟的氏族贵族迅速转化为奴隶主。新兴的奴隶主阶级渴望得到奴隶和财富。大禹顺应社会潮流，乘南方三苗族内部“大乱”之机，将早在尧舜时就已时断时续的对三苗的

①② 顾颉刚：《有仍国考》，《禹贡半月刊》，第10期。